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平定关陇纪略

(清) 易孔昭等◎著 孙文杰◎整理

人民日报出版社

平定关陇纪略

(清) 易孔昭等◎著 孙文杰◎整理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定关陇纪略 / (清) 易孔昭等著; 孙文杰整理.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15-5190-0

I. ①平… II. ①易…②孙… III. ①地方史—史料

—西北地区—清代 IV. 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1149 号

书 名: 平定关陇纪略

著 者: (清) 易孔昭等

整 理: 孙文杰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马苏娜 张炜煜

装帧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846 65363528 65369512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2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95 千字

印 张: 22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190-0

定 价: 78.00 元

《平定关陇纪略》整理小组

主 编 孙文杰

整理人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默	曹 雪	董怡君	黄伟华
李凡凡	李 阳	林宏磊	刘景辉
宁 燕	孙 炜	孙文杰	王海波
徐军华	徐玉娟	张 琪	

易孔昭与“同治新疆民变”

——以《福珠哩殒难碑》为中心

同治三年(1864),在“陕甘民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疆的库车地区也首先发难,数月之间,动乱席卷天山南北,波及全疆各地。至同治四年末,除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城、巴里坤、哈密尚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外,新疆其他地区均已失陷;到了光绪元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全疆沦陷,只剩下巴里坤危如累卵,成为清政府的最后根据地。这场变乱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都是新疆近代史上所罕见的。^①对此,前贤先哲的研究,多从新疆的沦陷与收复等宏观角度入手,探讨“同治新疆民变”发生的因由及收复新疆的过程与意义,而对微观的细节探讨则稍显不足。

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一个纪念物,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所藏《福珠哩殒难碑》拓片(以下简称“拓片”),反映了同治三年库车作为动乱的中心点向周边蔓延,天山南路渐次沦陷,以及后来清政府收复新疆的一个动态过程。它所揭示的内容不仅可与传世清代新疆文献互为印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资料细节的不足,甚至纠正了传统文献的某些错误。如在传世典籍《清史稿》《清实录》《新疆图志》等中,对于“同治新疆民变”中发难的“爱奚丁”、遇难的“福珠哩”虽有论述,往往前后矛盾、有所讹误,甚至对“福珠哩”殒难时间的记载也相互冲突。同样,在拓片的记录中,也可见事件发生后不久,人们的记录便开始走样。本文根据拓片记载,结合相关史料,重新探讨《福珠哩殒难碑》的相关问题,为深化对“同治新疆民变”的研究而提供细节资料。

一、《福珠哩殒难碑》拓片及早期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特藏馆收藏的《福珠哩殒难碑》拓片三件,其中

^① 纪大椿《试论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37~45页。本文叙述库车民变过程,虽观点有所不同,而事件经历,则主要斟酌此文之描述。

一幅背面有黄文弼先生毛笔标注的“原碑木刻”字样。拓片高 146 厘米，宽 66 厘米，5 行，满行 15 字，书体为魏碑体楷书。兹录文如下：

第一行：惟清同治三年五月库车逆回爱奚丁

第二行：等犯阿克苏城陷办事大臣福珠哩率

第三行：宾僚眷属自焚于西城隅百姓哀之沅

第四行：州易孔昭为纪其事而书之碑

第五行：光绪四年七月朔日

据此可知，《福珠哩殒难碑》由易孔昭撰文并书写，记载了在“同治新疆民变”中为抵御爱奚丁叛军入侵而英勇就义的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的壮举。内容虽较为简短，但却蕴含丰富，不仅是“同治新疆民变”的重要历史见证，而且是反映晚清新疆历史的珍贵文物。

作为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与奠基人，黄文弼先生一生曾先后于 1928—1930、1933、1943—1944、1957—1958 年四次深入新疆考察。拓片究竟拓于何时呢？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所载：1928 年 5 月—1929 年 10 月，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塔里木盆地展开遗迹调查，采集了大量文物。他在 1928 年年底到达阿克苏之后，就了解到温宿县的温泉有石碑，因此在新年伊始，就前往考察。1929 年 1 月 3 日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考察和捶拓过程：

1 月 3 日。今日拟往回城答拜汤县长，并考察温泉石碑。……饭后至温泉游览。有池方广二丈许，围以木栏，泉水清澈，微暖，全城百姓取汲焉。旁有石碑 2 方：一为光绪四年温宿县长湖南易孔昭所立，书“甘泉”两字……又有石刻一方，亦为易孔昭所立，其文云：“惟清同治三年五月，库车逆回爱奚丁等犯阿克苏，城陷，办事大臣福珠哩，率宾僚眷属自焚于西城隅，百姓哀之。沅州易孔昭为记其事，而书之碑。光绪四年七月朔日。”此碑年代虽不久，然与此地掌故颇有关系，故亦锥搗数份，以资考察，为研究回疆史者取资焉。^①

从黄文弼的日记中还了解到，此后两日，他又派手下蓝福等人连续前往拓字，5 日那天遇到温宿的巴扎，不仅“观者甚众”“后县长亦至观看拓碑，稍时方去，并索拓片 2 份”^②。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到，易孔昭是在温宿任上，不仅

① 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375 页。

②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376 页。

为温宿民生所系的泉水命名并立石，同时又将福珠哩殉难的碑刻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全城民众取汲用水、举行集市“巴扎”的地标上，其纪念死难者的意义非常明显，选择的地点也非常恰当。因为温宿县在同治民变发生之前，就是阿克苏办事大臣驻扎之地。

日记所记录的碑刻与拓片注文的唯一不同，是日记记载的原碑是石刻，而拓片背面的标注却是“木刻”。也许是由于碑刻多为石制，日记里便用石刻作为对碑刻笼统的说法；而实际的材质却是木制，所以会在拓片上专门做了标注。

殉难碑无论是什么材质，早就湮没在温宿老城中，甚至同时的“甘泉”碑，已经是泉留碑去，至今下落不明。一篇《追寻温宿老城》的文化游记，描述了温宿这个叫“老龙泉”的地方，曾经有过碑刻，作者说：“现在碑已不知去向，我只看见临摹的碑文复印件。”甚至，由于对那段历史的模糊认识，使得原碑的竖立者，也被他误解成了“名叫楚源易、孔昭（或为楚源、易孔昭）的两个湘军官员”^①。

岁月淡化了的新疆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纪念物，如今却因为黄文弼的拓片制作，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其日记所断言，可以“为研究回疆史者取资”。

事实上，黄文弼先生的拓片最早产生的影响，是在1932年5月10日的《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上，公布了标记有“黄仲良先生赠拓本”的“本院陈列品”《福珠哩殉难碑》，并发表了将近500字的研究成果（图1）：

《清史稿·疆臣年表》：福珠哩，以同治元年署阿克苏办事大臣，三年六月殉。此碑作五月，《年表》自福珠哩后，终同治朝阿克苏办事大臣阙人。按：同治三年八月癸酉，谕新授伊犁领队大臣爱隆阿、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德克吉纳、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吐鲁番领队大臣札克当阿、古城领队大臣联捷、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惠庆、叶尔羌帮办大臣常绩、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常明、和阗办事大臣奎章、乌什办事大臣庆明、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哈密帮办大臣明瑶简放已久，尚未据报抵任，著阿克敦布、刘长佑、沈桂芬查明各该大臣行抵何处，即传知迅速赴程前进，毋许再有稽衍。是以福珠哩殒难后尝简崇恩继任，以新疆全境沦陷未尝受事也。及左文襄公西征出关，收复新疆，阿克苏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为刘襄勤公铭传克复。八年，刘公以钦差大臣与陕甘总督谭公钟麟，奏改新疆为行省，

① 吕娜《追寻温宿古城》，《丝绸之路》2014年17期，28~34页。“楚源、易孔昭”应该是“楚沅易孔昭”一人的误读，“楚沅”是“易孔昭”的籍贯所在。

添设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官，裁南路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设置郡县，于阿克苏设温宿直隶州。二十八年，升置温宿府，移治州南三十里之新城。而以故州治，置温宿县，土名温宿老城。民国二年四月，改温宿府为阿克苏县。三年六月，与温宿县并隶阿克苏道，以阿克苏县为道治。十七年七月，废道，并直隶新疆省。^①

作为拓片最早的研究，作者在简短的文字中，主要考证了福珠哩的任职与温宿县的沿革，但由于对新疆史事的陌生，导致了許多失误，如将收复新疆的“刘襄勤公”刘锦棠比定为刘铭传等。福珠哩事迹主要根据《清史稿》等材料，不仅对于殉难的时间难得确解，也颠倒了福珠哩与崇恩任职阿克苏办事大臣的因果关系。

拓片中的爱奚丁究系何人？福珠哩殉难的时间究竟是五月、六月还是其他？他的名字在清史中正确的写法是什么？易孔昭在怎样的背景下立碑？这些关系殉难碑乃至同治民变的关键问题，仍有待发覆。

二、库车民变及爱奚丁

同治三年之前的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之中，具体到新疆的影响而言，日渐衰败的清政府已无力承担新疆岁需的两百万两饷银。至同治元年，时断时续的各省协饷完全断绝，清政府只能通过各种强取豪夺的手段来维系在新疆的统治。^② 口外的民生凋敝，陕甘的动乱不靖，导致一些驻疆大臣拒不上任、在内地无故逗留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官兵也经常借故滋事。在



图一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
刊载拓片及研究文字

① 《福珠哩殉难碑》，《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16期（1932年5月10日）第二版。

② 相关研究，可参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原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收入作者著《清代新疆研究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224~241页。

这样的情况下，新疆各地小规模动乱时有发生，且越来越频繁^①，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动乱即将到来。

同治三年春，一批无力缴纳赋税的农民被迫在库车渭干河修渠开荒，他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冻累，还要遭受清政府官吏的鞭挞殴打，托乎提尼亚孜等人率众反抗，杀死清政府两名官吏与十五名伯克，随后又向库车城进军。其后，城外各族群众在回民杨春、马三保等人领导下云集响应，焚毁军台及城厢商铺，时任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求援未及，库车城旋于六月六日被攻破，萨灵阿等政府官吏及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八名伯克被杀。但此时的库车农民认为自己身份低贱，不能掌权，逼迫曾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库车郡王爱玛特为其首领。爱玛特为库车伯克鄂对之后，不仅严词拒绝，并带兵反抗。《新疆图志》记载：“爱玛特，库车回部郡王。同治三年五月回变，带兵拒贼，力战阵亡。”^②此后，暴动者又找到了时任库车额什麻札清真寺阿訇的热西丁和卓，推举其为首领，此后的民变逐渐改变了它的轨道，走向了宗教仇杀。对于这一段历史，《新疆图志》也有着详细的记载：

咸丰以来，中原多故。陕甘回匪相继为乱，恶氛狂焰煽及西土。冲筠之党，枭黠之徒，闻声响应，玩祸弄兵。于是天山南北烽火亘两万余里，所在糜沸，贼如猬毛而起矣。初，同治初元，伊犁三道河回匪杨三惺、马二聚党谋乱……三年夏四月，库车土回马澄谋为乱。玉门杨春，回逆党也，潜至库车，结回目黄和卓及田满拉、苏满拉同时反。己亥，焚库城。五月壬寅，城陷。办事大臣萨凌阿、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叶尔羌帮办大臣武仁布死之。札萨克郡王爱玛特被胁不屈，遇害。^③

黄和卓，即拓片提及的爱奚丁，又作拉希丁和卓，其自谓是“先知默罕默德最伟大的后裔、宇宙力量的主宰者”，自称“热西丁汗和卓”。变乱民众将“汗和卓”译为“皇和卓”，清文献用同音字将其称之为“黄和卓”^④。作为狂热的宗教分子，热西丁喊出了“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砍到了异教徒的头上”^⑤，煽动信教民众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并派兵向西攻占了阿克苏、乌什，向东攻取喀

① 庆英《遵旨申明库车回子聚众滋事各情折》，《庆固奏稿》第2卷，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4年，21页。

② 王树相《新疆图志》卷一一三，《续修四库全书》6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40页。

③ 王树相等《新疆图志》卷一一六，659页。

④ 萧一山《清朝通史》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968页。

⑤ 《伊米德史》上册，87页。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中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4页。

喇沙尔，基本控制了回疆东四城一带。

在库车民变的影响下，此次动乱席卷天山南北。同治四年二月，喀什噶尔回目金相印、布鲁特头目思的克等人也在喀什噶尔、和田等地相继掀起动乱，因无力攻占清军驻守的喀什噶尔汉城，便邀请流亡浩罕的白山派和卓后裔入境助战。浩罕执政者随即派阿古柏携波罗尼都曾孙布素鲁克入侵新疆。^①同年，热西丁因西征喀什噶尔受挫，便与阿古柏结互不侵犯之盟，辖喀什噶尔以东、喀喇沙尔以西地区，自称“土耳其斯坦王”^②。此时的热西丁，逐渐受到了阿古柏建“哲德沙尔国”观念的影响，在阿克苏、库车地区疯狂屠杀蒙汉等各族人民。同治八年，在阿古柏军队逐渐北上的打击下，热西丁最终在库车城陷落时被杀。《新疆图志》记载了他的最后下场：“是年，安夷以兵至库车，杀回目黄和卓。”^③

三、“福珠哩”其人及殉难时间

清代以来的历史文献对于福珠哩殉难的记载，多有不一。如下表所示：

表一 文献记载中的福珠哩殒难时间

《福珠哩殒难碑》	清同治三年五月，库车逆回爱奚丁等犯阿克苏。城陷，办事大臣福珠哩，率宾僚眷属自焚于西城隅
《清史稿·疆臣年表》	同治元年四月壬申，阿克苏办事大臣奎栋迁。崇恩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署。同治三年六月，福珠哩殉 ^④
《清史稿·穆宗本纪》	(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回匪陷阿克苏、乌什，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 ^⑤
《戡定新疆记》	(同治三年)五月壬寅，阿克苏办事大臣富珠哩飞檄征伊犁兵，未至，阿城旋陷，富珠哩举家自焚，东四城相继陷 ^⑥
《清季职官表》	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同治元年四月廿日任，四年十二月七日离职(缘事未到任)；富珠哩，同治元年四月廿日署，三年六月日殉难 ^⑦

①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26~28页。
② 萧一山《清朝通史》下卷，969页。
③ 王树枏等《新疆图志》卷一一六，663页。《伊米德史》所记热西丁被杀时间为同治六年，详见冯家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内部刊物)，1956年，378页。本文以《新疆图志》所载为准。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8230~8234页。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一，804页。
⑥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20页。
⑦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31、1133页。

综上，福（富）珠哩殉难时间有同治三年五月、六月、十一月不同的说法，相互抵牾。《清实录》与《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判定是非。《清穆宗实录》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记载：“赏阿克苏办事大臣奎栋副都统衔，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太常寺少卿崇恩副都统衔，为阿克苏办事大臣。”^①随后，因受“陕甘民变”影响，道路阻隔，抑或借故拖延，崇恩并未能如期到任，同治帝于闰八月十五日对其加以申斥：“阿克苏办事大臣一缺，本年四月二十日简放崇恩，迄今四月有余，尚未具折请训，查无起行日期，殊不可解……乃竟视为畏途，观望耽延，全不以公事为重，胆玩已极，甚属可恶……着该旗查明，严催起程，如敢迟延，即着严参惩办。”^②直到同治二年二月六日，山西巡抚上奏：因“陕甘民变”致使驿路梗塞，阿克苏办事大臣不能赴任，请求暂行回京。对此，同治帝当即驳回：“昨据多隆阿奏，王阁村等处业已攻克，崇恩等着即探明前进，毋庸回京。”^③但是，正如前所揭，因为种种原因，以致同治三年六月六日库车城被热西丁所率叛众攻陷时，崇恩仍然没能到任。六月十六日，同治皇帝为此专门再下御旨：

库车城陷后，阿克苏系属毗境，所居回民倍于他处，防务关系紧要，现派员带兵五百名驰赴阿城……阿克苏系属冲衢，素称饶裕，逆回垂涎已久，防守极为吃紧，着崇恩兼程前进，速赴新任，倘再一味畏葸，迁延不进，致误戎机，必将崇恩从重治罪。富珠哩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责无旁贷，即着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不可稍有疏失^④。

随即，在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的富珠哩即上奏《库车官员被害阿克苏回子闻风滋事折》的当月二十三日，同治皇帝即降旨：“阿克苏所属之赛里木、拜城无业回子闻风滋事，亟应妥为弹压，着富珠哩督饬派出之赵维杰等军，速赴赛里木、拜城，先行设法抚辑，再赴库车实力进剿。”^⑤

从以上的记载可见，由于原阿克苏办事大臣奎栋迁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朝廷任命太常寺少卿崇恩离京赴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在他未能从内地到达任所

① 《清穆宗实录》卷二五“同治元年四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91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四〇“同治元年闰八月乙未”，1077~1078页。

③ 《清穆宗实录》卷五七“同治二年二月壬午”，91页。

④ 《清穆宗实录》卷一〇六“同治三年六月乙酉”，328~329页。

⑤ 《清穆宗实录》卷一〇七“同治三年六月壬辰”，346页。

期间,就由先前即在新疆任职的富珠哩代理(署理)此职^①;又由于受陕甘和新疆民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崇恩始终不能到任,富珠哩的署理之职,一直持续到两年之后阿克苏陷落。因此,《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上有关“福珠哩殒难后尝简崇恩继任”的说法其实是颠倒了任命的先后顺序。

那么,阿克苏究是何时被攻陷?富珠哩又是何时殒难的呢?在富珠哩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后,由于新疆战事日紧,形势日危,清廷在同治三年八月五日、十月四日两度严催崇恩即刻赴任^②,但都没有提及阿克苏城陷落及富珠哩殉难之事,所以上表所说五月、六月殉难,并非事实。在此期间,富珠哩一面率领阿克苏各族民众坚守阿克苏,一面向各地求援,顽强地抗击热西丁大军的西下。但由于清政府分散设防的策略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阿克苏城还是在富珠哩担任署理大臣的时候陷落了。同治三年十一月乙卯,同治皇帝对常清、明绪上奏的《沥陈伊犁地方情形并乌什、阿克苏被占》一折汇报的“新疆南路各城先后被贼占据”做出了上谕,这是关于阿克苏在同治三年被占领的记载。^③对此,《清史稿·穆宗本纪》的所载与此接近:“(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回匪陷阿克苏、乌什,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④两者的时间都在十一月,但是也有矛盾的地方:《穆宗本纪》说到陷落的甲寅,时当十一月十七日;《清实录》记同治皇帝就伊犁情形和乌什、阿克苏被占奏折给予的上谕的乙卯日,时当十一月十八日。呈递奏折的常清、明绪,是当时先后任职伊犁将军的大臣。根据阿克苏城陷的消息传到伊犁,又从伊犁到北京的六百里加急快递的军台传邮来计算,这个情报最快速度也在二十天左右。^⑤因此,很可能是清廷官员在同治皇帝身后编纂《清实录》时,将奏折在伊犁书写的时间代替了后来上谕的时间。而更晚编纂的《清史稿》则根据源文件记录了阿克苏城陷落的确切时间。

① 富珠哩之前在新疆任职事,仅见于《清文宗实录》卷二三四“咸丰七年八月己巳”载:“以伊犁官兵剿贼出力,赏协领伊勒哈布、富珠哩,防御德克吉春、锡拉苏、德格都巴图鲁名号。”640页。疑此富珠哩即后来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者。前述《方略》记载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常清奏言库车民变时,即言“迭接署阿克苏办事大臣、协领富珠哩咨称”云云,清内府光绪活字本,卷六九,叶一正。据此可知富珠哩正是以协领衔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的,与《清文宗实录》所记官职相符。

② 详见《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一“同治三年八月癸酉”,462页;卷一一七“同治三年十月辛未”,591页。

③ 详见《清穆宗实录》卷一二一“同治三年十一月乙卯”,670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一,804页。

⑤ 伊犁到北京的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道路长10249里,捷报处急用飞递军台道路长9290里。相关信息,参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60~73页;1980年2期,93~102页。

这个问题确实在《方略》的记载中得到确认。《方略》在“十一月”下记载：

十八日乙卯，常清、明绪奏言：……至乌什、阿克苏，迄无确耗。前据叶尔羌参赞大臣奎栋咨报该二城危急情形，恐有不测。现据贡古鲁克山口防堵之总管得克都报称，该二城已为回匪所踞。臣等接阅之下，不胜愤懑。其二城文武官员下落，再行设法确查。^①

《方略》抄录了常清、明绪上奏的《沥陈伊犁地方情形并乌什、阿克苏被占》一折全部内容，上奏的时间是十八日，当然是在伊犁书写奏折的时间。从这里我们了解到乌什、阿克苏沦陷的准确消息，是由防守伊犁与乌什接壤的贡古鲁克山口总管得克都上报伊犁将军后，由伊犁将军快马呈递进京的。因此十一月十七日，可能是得克都上报阿克苏沦陷消息的时间。虽然在以上的奏折里提及“二城文武官员下落”需要“再行设法确查”，从《清史稿·穆宗本纪》的上引记录“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来看，确查的结果是富珠哩等在城池陷落之际已经殉难。

以上资料的排比中，我们还发现拓片中殉难的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往往又写成了“富珠哩”，究竟这两者是否为同一人名的异写，抑或同名异人？

在清代，“福珠哩”与“富珠哩”其实都是含义为世袭的一个常用满族名字（Fujuri）的不同翻译^②，本来也不需要认真分辨。但是具体到阿克苏办事大臣任上的官员，却恰好出现了先后两位 Fujuri，就使得他们的汉文名字有了分辨的必要。

如前所述，在阿克苏城陷落后，直至同治四年十二月，崇恩一直未能赴任，他最后的仕途结局，在十二月六日的上谕中被提及：

戊戌，谕内阁：崇恩奏“病已成废，恳请休致”一折，副都统衔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自简任以来，在途耽延日久，以致道路梗塞，不能赴任。本日由张家口折回，随同联捷带兵出关，辗转迟滞，畏葸不前。兹复以病势日笃，恳请休致，实属有负委托，仅予休致，不足示惩。崇恩着即革职回旗。^③

从上记载可知，崇恩因为一味拖延任职，没有得到体面的“休致”，而是受到了“革职回旗”的处分。随即，清政府于本月十八日下达了新的阿克苏办事大臣任命：

① 《方略》卷八五，叶一一背至一二背。

② 此承新疆师范大学同事锋晖博士赐告。

③ 《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二“同治四年十二月戊戌”，753~754页。

以副都统衔伊犁协领福珠哩为阿克苏办事大臣。^①

这位福珠哩一直在阿克苏办事大臣任职到同治十年，最后调任广州。这也是《清实录》明确记载了的事实：

以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为广州满洲副都统。^②

同治四年后任职阿克苏办事大臣的福珠哩与殉难碑所记人名完全同名，而且也都是从伊犁协领的职位升任阿克苏办事大臣。但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就显得匪夷所思。所以，这是两个在新疆任职而时年接近的重名的满族官员。试对比同治以来的相关文献如下：

表二 文献记载中的“富珠哩”与“福珠哩”

富珠哩	福珠哩
《清穆宗实录》卷一〇六“同治三年六月乙酉”：“富珠哩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责无旁贷，即着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不可稍有疏失。”	《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三“同治四年十二月己酉”：“以副都统衔伊犁协领福珠哩为阿克苏办事大臣。”（参上引）
《清穆宗实录》卷一〇七“同治三年六月壬辰”：“阿克苏所属之赛里木、拜城无业回子闻风滋事，亟应妥为弹压，着富珠哩督飭派出之赵维杰等军，速赴赛里木、拜城，先行设法抚辑，再赴库车实力进剿。”（参上引）	《清穆宗实录》卷三一七“同治十年八月辛未”：“以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为广州满洲副都统。”（参上引）
	《清德宗实录》卷六六“光绪四年正月丁丑”：“广州副都统福珠哩……转战二十余年，受伤多处。现在旧伤复发，病难速痊，着准其开缺回旗调理。” ^③
《戡定新疆记》：“（同治三年）五月壬寅，阿克苏办事大臣富珠哩飞檄征伊犁兵，未至，阿城旋陷，富珠哩举家自焚，东四城相继陷。”（参上引）	《福珠哩殉难碑》：“同治三年五月，库车逆回爱奚丁等犯阿克苏，城陷，办事大臣福珠哩，率宾僚眷属自焚于西城隅。”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三“同治四年十二月己酉”，776 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三一七“同治十年八月辛未”，196 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六六“光绪四年正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18 页。

续表

富珠哩	福珠哩
《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三年）十一月壬子，回匪陷阿克苏、乌什，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参上引）	《清史稿·疆臣年表》：“同治元年四月壬申，阿克苏办事大臣奎栋迁。崇恩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署。同治三年六月，福珠哩殉。”（参上引）
《清季职官表》：“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同治元年四月廿日任，四年十二月七日离职（缘事未到任）；富珠哩，同治元年四月廿日署，三年六月日殉难。”（参上引）	《清季职官表》：“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同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任职，同治十年八月十三日因调广州满洲副都统而离职。” ^①

从上引文献看来，在同治年间，为了分清这两位阿克苏办事大臣的同名者的先后，官方记录的前者对应的汉名是“富珠哩”，后者是“福珠哩”。《清实录》根据当时的档案史料纂写，所以两者的分别是非常清楚的。《清史稿》的《穆宗本纪》也没有出错，但是在《疆臣年表》中，可能发现了两个“福（富）珠哩”先后接任阿克苏办事大臣，觉得可能是重复记录，在无法覆按的情况下，对于前任阿克苏办事大臣用了“福珠哩”这个名字，而放弃了后任的记载。这个错误，在《清季职官表》予以了更正。当易孔昭担任阿克苏善后委员的时候，也许觉得殉难者和后任者本来就是同名的两人，一存一殁，毋庸通过汉字的差别来区分，就根据自己的习惯写成了“福珠哩”。

不过，如果仍然要还原到清代新疆同治、光绪年间的历史中来讨论这一殉难碑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富珠哩”与“福珠哩”实为前后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在“同治民变”中遇难的是“富珠哩”，易孔昭所撰《福珠哩殒难碑》实当作《富珠哩殒难碑》。

四、易孔昭与《福珠哩殒难碑》

《福珠哩殉难碑》的作者易孔昭，是晚清在左宗棠平定西北过程中重要的一员。有关他的材料，主要集中在《黔阳易氏宗谱》《左宗棠全集》《例授资政大夫仲潜公传》中。今根据这些材料，略叙其生平如下：

易孔昭（1835—1896），字仲潜，湖南黔阳县洗马潭人，咸丰十一年

^①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28页、1133页。

(1861)拔贡。同治二年,其伯兄易武昭在随曾国荃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战死于武昌,易孔昭前往安徽拜谒曾国藩并呈上《平贼方略》^①。在曾国藩的赏识并向朝廷的推荐下,易孔昭开始走上仕途。^②他开始在杨岳斌水师办理章奏兼管营务,其后又被曾国藩派回黔阳,招募湘军四营进驻孝陵卫。同治三年,易孔昭因率部攻入南京,并生擒曾击杀其伯兄易武昭的太平天国“章王”林绍章,事定叙绩,以知县选用,加同知衔。但是,易孔昭以“我生不作封侯想,阵斩仇寇愤已消”^③,寻假归省故里。直到同治九年,左宗棠平定“陕甘民变”,始调易孔昭办甘南支应局,兼理南路粮饷器械。同治十二年,关陇平定,以知府留甘候用,随以丁父忧而归乡。^④

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三月十九日,左宗棠在筹备军饷、采办粮饷、运输粮饷器械等方面为收复新疆做准备遇到重重困难之际,不禁又想到了前在平定关陇时出色完成湘军后勤供给任务的易孔昭。虽然此时易孔昭丁忧在籍,左宗棠还是引用墨经从戎之义,亲自给易孔昭写信:“西征筹饷已艰,行军绝域,粮糈,尤兵士命脉,非公廉勤莫办。”^⑤左宗棠在请易孔昭复职的同时,也向朝廷上折奏请征调其出关,最后易孔昭以同知衔赴营差委,随清军出关。易孔昭在办理粮秣饷械等职责上,“飞刍转粟,益殫劳瘁,士饱马肥,戎师殚奋”^⑥。因此,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以及充足的后勤保障下,清军势如破竹,至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已经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东四城,^⑦又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收复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西四城。^⑧至此,回疆八城全境肃清,天山南路地区全部收复。

易孔昭殫尽劳瘁于后勤保障之责,得到左宗棠的赞赏。当回疆八城被收复后,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左宗棠向朝廷奏请:“道员用留甘补用知府易孔昭,

① 详见《黔阳易氏宗谱》,三畏堂,1947年印本,11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七四“同治二年七月戊辰”:“湖南拔贡生易孔昭、江苏生员管乐并着准其调赴军营差遣委用。”504页。

③ 详见袁钦绪《例授资政大夫仲潜公传》,《黔阳易氏宗谱》,18页。

④ 《黔阳易氏宗谱》,12页。

⑤ 袁钦绪《例授资政大夫仲潜公传》,《黔阳易氏宗谱》,19页。

⑥ 袁钦绪《例授资政大夫仲潜公传》,《黔阳易氏宗谱》,19页。

⑦ 《清德宗实录》卷六二“光绪三年十一月壬申”,861页。

⑧ 《清德宗实录》卷六七“光绪四年二月壬辰”,36页。

请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遇缺尽先题奏，并赏加盐运使銜。”^① 左宗棠的这一请求，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知府易孔昭，着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遇缺尽先题奏，并赏加盐运使銜。”^②

此时的天山南路地区百废待兴，又当新疆筹建行省之际，各地经理乏人。而易孔昭跟随左宗棠多年，作为清军平定新疆战争的亲历者，对边情也较为熟稔。当光绪四年五月，刘锦棠向左宗棠推荐易孔昭等办理其地善后事宜时，左宗棠当即同意并向朝廷上折：“至袁守垚龄、易丞孔昭、英守林、李县丞庆棠均各有所长，固亦一时之选。行省郡县议定奉旨，则需才极多，当登之荐牍。”^③ 随后，清政府授易孔昭为阿克苏善后委员，署甘肃巩秦阶道，地位相当于民变之前的阿克苏办事大臣。^④ 前述黄文弼先生在日记中以“温宿县长”称呼易孔昭，实际上是以光绪二十八年温宿降格为县之后的官称来拟想的。之前的温宿城是阿克苏办事大臣及后来温宿府驻地，作为善后委员的易孔昭正是在办事大臣驻地从事其南疆收复的善后工作的。

阿克苏自同治三年十一月被热西丁叛军攻破，至光绪三年十一月被收复，十三年间的血雨腥风，致使阿克苏满目疮痍，易孔昭到任后，面对的是“各路难民，死亡枕籍”的惨痛情景和苦难现实。^⑤ 因此，当易孔昭在处理善后事宜时，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当初攻陷阿克苏城的罪魁祸首热西丁，更能想起因城陷而举家自焚的前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富珠哩。为表彰富珠哩的壮举，纪念死难官兵，易孔昭才撰写《福珠哩殒难碑》，并刻木纪事。但由于彼时的新疆文案缺失、问道莫由，致使易孔昭不能了解富珠哩殉难的确切时间，因而把“同治三年五月”库车城最早的陷落当作了阿克苏等地相次遭难的时间。同样，作为湘军元老的魏光燾后来撰写《戡定新疆记》，也一样将阿克苏与下属的库车同等处理，误将富珠哩遇难时间写作“同治三年五月”。不过，不管是此“福珠哩”非彼“富珠哩”，还是将其殒难时间由“同治三年十一月”误作“同治三年五月”，并不影响易孔昭《福珠哩殒难碑》作为“同治新疆民变”的纪念物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其后在阿克苏管理善后的易孔昭，据说实行了“诘奸暴、除烦苛、清户口、

① 左宗棠《克复南路西四城新疆肃清恳请恤奖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第七册，44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六七“光绪四年二月壬辰”，38页。

③ 左宗棠《湘军刘总统稟论人才由》，《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447页。

④ 《黔阳易氏宗谱》，12页。

⑤ 袁钦绪《例授资政大夫仲潜公传》，《黔阳易氏宗谱》，19页。